

巴以冲突的治理难题与前景分析^[1]

孙德刚 马文媛

【内容提要】巴以问题是中东地区安全及国际关系的核心问题。2023年10月，巴以冲突再度爆发并产生溢出效应，形成了四组矛盾：一是哈马斯等“抵抗联盟”成员与以色列的军事博弈，二是阿拉伯、伊斯兰国家以及“全球南方”左翼政府与以色列的政治博弈，三是国际社会与美以的外交博弈，四是全球亲巴力量与亲以势力的舆论博弈。围绕巴以问题的解决出路，国际社会提出了反恐怖主义论、反殖民主义论和共生关系论三种不同的治理路径，各种治理方案相互竞争，对巴以和平、中东国际关系和大国的中东战略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国站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积极践行全球安全倡议，主张在“两国方案”和联合国相关决议的基础上实现阿以两大民族和平共处，为巴以冲突治理贡献安全和智力公共产品，与国际社会一道助力中东和平与发展事业。

【关键词】巴以冲突 安全治理 大国协调 中东政治 中国中东外交

【作者简介】孙德刚，复旦大学中东研究中心主任、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马文媛，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241 (2024) 01-0132-23

[1]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大国在中东博弈的新动向与中国中东战略研究”（项目编号：23AGJ011）的阶段性成果。作者感谢《和平与发展》匿名评审专家及编辑部对本文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文中错漏概由本人负责。

2023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组织（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名为“阿克萨洪水”（Al-Aqsa Flood）的军事行动，以色列随即宣布实施报复行动，双方在加沙以及约旦河西岸地区发生激烈对抗，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吉哈德）、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伊拉克“真主旅”和“人民动员组织”以及叙利亚和伊朗等国也以实际行动策应哈马斯，巴以冲突随之升级和外溢。

新一轮巴以冲突给双方平民造成了21世纪以来中东最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据巴勒斯坦卫生部统计，截至2024年2月13日，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已造成加沙地区约2.8万巴勒斯坦人死亡。以色列政府的统计数据显示，此次冲突共造成约1200名以色列平民死亡，250人被劫持为人质，近200名以色列武装人员在加沙军事行动中死亡。^[1]这场冲突还造成200多名联合国人员和记者丧生，加沙90%的人口流离失所，超过60%的房屋被毁，数十万民众挤在临时帐篷里艰难度日。^[2]巴以冲突还产生了溢出效应，中东安全危机和全球外交危机相互叠加，美以联盟与伊朗领导下的“抵抗联盟”剑拔弩张，加沙巴以冲突引发红海危机，威胁全球供应链安全和国际贸易畅通。

巴以冲突长期得不到解决并再次激化，其背后有着复杂的历史、宗教、地缘政治等原因，并对中东地区局势和全球战略格局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一、新一轮巴以冲突的发生背景和特点

新一轮巴以冲突的爆发具有深刻的时代背景。首先是美国在“先阿以、

[1] “Live Updates: Gaza’s Death Toll Mounts as Negotiators Cite Progress on a Cease-fire Deal,” *the Associated Press*, February 13, 2024, <https://abcnews.go.com/International/wireStory/live-updates-china-calls-israel-halt-military-operations-107182873>.

[2] 《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大使在安理会巴以问题公开会上的发言》，外交部网站，2024年1月12日，https://www.fmprc.gov.cn/zwbdb_673032/wjzs/202401/t20240113_11223163.shtml。

后巴以”^[1]理念指导下，试图推动阿以双方掀起新一轮和解潮。阿以矛盾曾是中东国际关系中最根本、最基础的分裂线，20世纪90年代后，巴勒斯坦问题成为阿以矛盾的核心。2002年的阿盟峰会通过《贝鲁特宣言》(Beirut Declaration)，把公正解决巴勒斯坦问题作为阿拉伯国家同以色列建交的前提条件。而随着中东局势的演变和美国中东战略的调整，2020年9月，在美国特朗普(Donald Trump)政府推动下，以色列与阿联酋、巴林共同签署《亚伯拉罕协议》(Abraham Accords)并实现关系正常化。同年10月和12月，苏丹和摩洛哥也分别加入这项进程与以色列建交。拜登(Joseph Biden)执政以来，美国继续大力推动沙特和以色列和解，并鼓励以色列与更多阿拉伯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帮助以色列在阿拉伯世界实现“外交突围”，以形成美国—以色列—阿拉伯“铁三角”，共同遏制伊朗领导下的“抵抗联盟”(伊朗领导下的什叶派力量+哈马斯)。《亚伯拉罕协议》主张通过搁置巴勒斯坦问题促进阿以和解，导致巴勒斯坦问题日趋边缘化。而沙特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则进一步引发以哈马斯为代表的巴勒斯坦各派力量对自身被边缘化的深度担忧。加之自2007年哈马斯从法塔赫手中夺取加沙控制权以来，以色列对加沙地区实施了长达17年的封锁，导致加沙地区食品、药品等生活必需品供应不足，人道主义危机加剧，加沙地区反以、仇以情绪持续高涨，军事斗争成为哈马斯对以色列斗争的主要手段。故哈马斯抢在沙特与以色列关系实现正常化之前采取行动，一个重要考虑就是阻止阿拉伯国家通过搁置巴勒斯坦建国问题与以色列实现和解。正如哈马斯在2024年1月21日发布的《我们的叙事——阿克萨洪水行动》报告中所指出的，哈马斯发动袭击“是为对抗以色列针对巴勒斯坦民众的所有阴谋”，是“必要之举”和“正常回应”，“巴勒斯坦人民有能力决定自己的

[1] 美国将伊朗视为中东秩序的挑战者，故积极推动阿拉伯世界与以色列和解，构建反伊朗统一战线。鉴于以色列政府不愿意落实“两国方案”，巴勒斯坦内部分歧严重，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将复杂的巴勒斯坦问题搁置一边，试图优先实现海湾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带动其他阿拉伯、伊斯兰国家承认以色列，形成阿拉伯国家、以色列与土耳其大联合，孤立伊朗。

未来并对内部事务作出安排”。^[1]

其次是以色列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政府的右倾政策导致巴以矛盾进一步激化。从以色列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历史进程来看，无论是早期的异族统治，还是犹太民族长达两千年之久的“大流散”经历，抑或是建国初期与阿拉伯世界接续不断的战乱纷争，它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外部国家安全威胁”。在此背景下，“安全至上”或者说维护犹太国家（民族）本体安全的理念在以色列建国后日趋居于主导地位。^[2]2022年，以色列利库德集团、沙斯党、宗教犹太复国主义者党、圣经犹太教联盟、犹太力量党、诺亚姆党等右翼政党组建了史上最保守的政府。新政府推动司法改革并成立了国家全部，以反恐和去极端化为由肆意抓捕约旦河西岸以及耶路撒冷地区的巴勒斯坦抗议人员。2023年1月和5月，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伊塔马尔·本-格维尔（Itamar Ben-Gvir）连续2次进入耶路撒冷老城的圣殿山（穆斯林称“尊贵禁地”），引起巴勒斯坦政府和民众的强烈反对，认为此举是对穆斯林的严重挑衅和对圣地的亵渎。巴勒斯坦通讯社援引巴总统府发言人的话报道称，此类挑衅行为只会让紧张的巴以局势进一步升级。^[3]沙特《中东报》分析认为，本-格维尔2023年1月初擅闯“尊贵禁地”导致巴以冲突严重升级，5月他再次不顾后果践踏这一圣地，意在引发新一轮流血冲突，巴以局势如何演变令人担忧。^[4]同年10月，哈马斯发动“阿克萨洪水”行动，正是打着“保卫宗教”和“报复以色列右翼政府”的旗号。

[1] The Hamas Media Office, “Our Narrative…Operation Al-Aqsa Flood,” *The Palestine Chronicle*, January 24, 2024, <https://www.palestinechronicle.com/wp-content/uploads/2024/01/PDF.pdf>.

[2] 周少青、周洁：《以色列少数群体政策安全化问题评析》，载《西亚非洲》2023年第3期，第153页。

[3] 《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进入圣殿山区域引多国谴责》，人民网，2023年1月4日，<http://world.people.com.cn/n1/2023/0104/c1002-32599466.html>。

[4] Tzvi Joffe, “Ben-Gvir Visits Temple Mount: ‘We are the Masters of Jerusalem’,” *the Jerusalem Post*, May 21, 2023; 黄培昭：《以色列高官这个举动，把阿拉伯国家都惹怒了》，载《环球时报》微信公众号，2023年5月22日，<https://mp.weixin.qq.com/s/6Pdliicq3OryLDcPzPmsZA>。

新一轮巴以冲突已经持续4个多月，与以往历次巴以冲突相比，此次冲突呈现出一些鲜明的新特点。

一是以往的巴以冲突多是以色列处于攻势、 Hamas处于守势，而此次冲突是弱者对强者发动的先发制人打击。Hamas先下手为强，以小博大，抢先对以色列发动越境打击，造成了以色列军队和平民的重大伤亡，也招致了以色列极为惨烈的报复。以色列与Hamas实力悬殊，各自斗争方式也存在较大差异。以色列出动30万国防军清剿加沙地区的Hamas成员；Hamas组织总共只有约3万人，以非对称打击的方式同以军进行周旋。冲突爆发以来，以色列在加沙地区投掷了超过2万吨的炸药；Hamas则向以色列发射超过5000枚火箭弹，并利用地道和建筑物为掩护实施拖延战术，进行有限还击。以色列的强势报复行动使Hamas组织处于生死存亡的边缘。

二是以往的巴以冲突仅限于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双方，其他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基本处于观望状态，而此次冲突波及范围更广。新一轮巴以冲突所产生的强大冲击波塑造了四组博弈关系：其一是Hamas及其支持者吉哈德、也门胡塞武装、黎巴嫩真主党以及叙利亚和伊朗等同以色列的军事博弈，重点在加沙、红海、黎巴嫩南部地区；其二是阿拉伯、伊斯兰国家以及“全球南方”左翼政府同以色列的政治博弈，重点是巴勒斯坦人的生存权与建国权问题；其三是国际社会同美以的外交博弈，重点是人道主义停火止战；其四是全球范围内亲巴力量与亲以势力的舆论博弈，重点是“反殖民”还是“反恐”的话语权之争。巴以冲突对中东政治和国际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推动了中东权力的再平衡和大国中东战略的再调整。

三是以往以色列对Hamas的打击以空袭为主，而此次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具有先空中、后地面、步步为营、网格化清理的特点。以色列在加沙地区的军事行动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军事封锁，以断水、断粮、断电、断网为手段围困加沙地区；第二阶段为空袭，旨在破坏Hamas指挥、控制、情报系统，摧毁Hamas可能藏身的学校、医院、清真寺和其他建筑物；第三阶段为地面进攻，以色列国防军地面部队在战机和坦克的掩护下对加沙

北部的 Hamas 目标展开了持续激烈的进攻行动；第四阶段始于 2023 年 12 月 1 日，以色列与 Hamas 短暂停火一周后恢复交火，以色列将军事行动的重点由加沙北部扩大至 365 平方公里的整个加沙地区。与以色列对加沙北部地区实施前所未有的“地毯式”轰炸不同，其在加沙南部地区的军事行动更加强调精准打击，以搜查 Hamas 军事领导人藏身地和人质扣押地点为首要目标，以抓捕和围剿 Hamas 成员为主要任务，试图“以战促降”，摧毁 Hamas 的军事和心理防线。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旨在肃清 Hamas 武装，建立没有 Hamas 的“加沙新秩序”。^[1]

四是以往历次巴以冲突持续时间较短，而此次冲突呈现长期化和外溢化趋势。一方面，Hamas 和以色列虽一度达成临时性人道主义停火协议，但双方战略目标差异甚大，永久性停火协议迟迟未能达成。另一方面，新一轮巴以冲突已经产生外溢效应，增加了巴以冲突解决的难度。巴以冲突正从巴以之间的矛盾演化为由巴勒斯坦 Hamas、也门胡塞武装、黎巴嫩真主党以及叙利亚和伊朗等组成的“抵抗联盟”同美以集团的矛盾。为策应 Hamas 对以色列的军事斗争，也门胡塞武装在红海海域不断袭击前往以色列的商船，迫使美国发起“繁荣卫士”护航行动并宣称要组建一个多国海上联合部队，以对胡塞武装做出“坚定的国际回应”。自 2024 年 1 月中旬起，美英舰机对也门境内胡塞武装在首都萨那等地的目标发动了多轮军事打击。1 月 3 日下午，伊朗东南部城市克尔曼市发生连环爆炸案，造成 84 人死亡，超 200 人受伤。伊朗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 (Ayatollah Sayyed Ali Khamenei)、总统莱希 (Seyed Ebrahim Raisi) 都强调将对反伊朗势力进行坚决打击。^[2]1 月中旬，伊朗宣布伊斯兰革命卫队利用弹道导弹对叙利亚和伊拉克境内的反伊朗目标发动袭击，据称摧毁了伊拉克库尔德地区首府埃尔比勒的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中心及“伊斯兰国”在叙利亚的据点。

[1] 《加兰特：我们的目标是在加沙建立一个新秩序》(阿拉伯文)，今日新闻网，2023 年 10 月 21 日，<https://akhbarelyom.com/news/newdetails/4220601/1/عاشن-انفده-تنالاج> - قرغ-يف-ديج-م-اظن。

[2] “Islamic State Terror Group Claims Responsibility for Deadly Iran Attack,” *The Irish Times*, January 4, 2024.

2024年1月底,美军位于约旦东北部靠近叙利亚边境的“第22号塔”军事基地遭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美军士兵死亡、40多人受伤,这是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美军士兵在中东首次遇袭。美国指责伊朗是该事件的幕后黑手,并于2月2日对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及其附属民兵组织使用的设施等超过85个目标进行了空袭。拜登还声称,美国的回应“将在我们选择的时间地点继续下去”。从加沙冲突到红海危机,从东地中海到海湾地区,美国、以色列和伊朗在黎巴嫩、叙利亚和伊拉克的特别军事行动不断升级。美以联盟和伊朗领导下的“抵抗联盟”之间的矛盾不断上升,中东恐怖主义死灰复燃,凸显了巴以冲突的外溢效应和常态化趋势。2024年是“大选年”,除印尼等国已完成大选外,美国、日本、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等国将迎来新一轮国家领导人选举,巴以冲突导致各国舆论撕裂,对上述国家国内政治将产生重要影响。尤其是美欧各国不时爆发对巴以冲突双方持不同立场和态度的民众示威游行,造成一定的社会动荡和分裂。

二、巴以冲突面临的治理难题及其根源

1917年英国外交大臣发表《贝尔福宣言》(Balfour Declaration)^[1]以来,巴以冲突经历了100多年的历史。二战结束后,阿拉伯国家不顾美苏反对,坚决抵制巴勒斯坦分治方案。1947年11月,美国强行要求联合国大会对巴勒斯坦分治方案进行表决,第181号决议最终以以色列、美国、苏联等33票赞成,阿拉伯11国和希腊、古巴共13票反对,英国等10票弃权的结果获得联大通过。^[2]决议规定英国于1948年8月1日之前结束在巴勒斯坦的

[1]《贝尔福宣言》系指1917年11月2日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致函英国犹太复国主义者联盟,表示英国政府赞同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家园,承认犹太人有重新回归到巴勒斯坦地区的权利。

[2]“Resolution 181: The Partition Resolution of 29 November 1947,” <http://www.1948.org.uk/un-resolution-181#:~:text=On%20Saturday%20morning%2C%2029%20November%201947%2C%20against%20the,opposed%20it%20and%2010%20members%20abstained%20including%20Britain.>

委任统治并撤出其军队后，在总面积 2.7 万平方公里的巴勒斯坦土地上建立两个国家，即阿拉伯国和犹太国。1948 年 5 月 14 日，犹太人在联大第 181 号决议案的基础上宣布建立以色列国，而阿拉伯国家则认为该决议违背了《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宗旨，明显偏袒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土地的分割极不公平，因此强烈反对该决议，拒绝建立阿拉伯国。后经过 5 次中东战争和地区局势变迁，巴以之间累积形成了许多难以解决的棘手问题，成为不时激化双方矛盾的痼疾。一是巴勒斯坦独立建国问题。以色列认为，2005 年以军从加沙撤出后，该地区成为 Hamas 和吉哈德进攻以色列的“桥头堡”，故以色列不会以牺牲国家安全为代价允许巴勒斯坦独立建国。^[1]2023 年 12 月，以色列通讯部长什洛莫·卡希（Shlomo Karhi）在同美国总统拜登会谈时指出，以色列不会回到《奥斯陆协议》(Oslo Accords)，不允许在约旦和地中海之间建立一个新国家，也不允许巴勒斯坦当局在“后哈马斯时代”管理加沙。^[2]二是巴以边界问题。1968 年以后，以色列开始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修建犹太人定居点，起初的目的是便于防御，但后来则成为犹太极端民族主义者建立大以色列而对土地实行有效占领以及政府容纳新移民的手段。以色列在历次中东战争中夺取了大量原属于拟议中的阿拉伯国的土地，1967 年 11 月通过的联合国安理会第 242 号决议要求以色列撤离被占领土，但遭到以色列政府的断然拒绝。^[3]当前，国际社会普遍主张以巴以 1967 年边界为基础，建立享有主权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这就意味着以色列必须将占地数千平方公里的犹太人定居点归还给巴勒斯坦。三是耶路撒冷地位问题。联合国以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主张以东耶路撒冷为首

[1] 莱希·本·希特里特、马哈茂德·贾拉巴：《两国方案缺位下的巴以冲突进程》（阿拉伯文），多哈：半岛研究中心，2021 年，第 3 页。

[2] Diyar Güldoğan, “Israel will not allow establishment of Palestinian state: Minister,” Anadolu Agency, December 13, 2023, [https://www.aa.com.tr/en/middle-east/israel-will-not-allow-establishment-of-palestinian-state-minister/3080959#:~:text=There will be no Palestinian state here%2C%27 says Shlomo Karhi&text=Israel will not allow the, “indiscriminate” bombing of Gaza.](https://www.aa.com.tr/en/middle-east/israel-will-not-allow-establishment-of-palestinian-state-minister/3080959#:~:text=There will be no Palestinian state here%2C%27 says Shlomo Karhi&text=Israel will not allow the, %20%22indiscriminate%22 bombing of Gaza.)

[3] 黄民兴：《中东历史与现状二十讲》，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138—139 页。

都来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但以色列却以立法的形式强调耶路撒冷是以色列永久的、不可分割的首都。2017年，美国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并将大使馆搬至耶路撒冷。四是巴勒斯坦难民回归问题。以色列只允许少量巴勒斯坦难民回归家园，而巴勒斯坦方面强调全体巴勒斯坦难民都有回归权。^[1]以上症结和难题相互叠加，导致巴以双方陷入持久的冲突恶圈。

巴以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并时而激化，其背后有着复杂的历史、宗教、地缘政治等原因：

一是巴以争端中的宗教因素赋予了巴勒斯坦所在的这块土地神圣化和宗教化色彩。中东是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的共同发源地，耶路撒冷同时被犹太人和阿拉伯人视为“圣城”。巴以冲突是一块土地、两大民族的争端，同时也打上了“宗教纷争的烙印”。从以色列方面说，犹太民族虔信自己是“上帝特选子民”，巴勒斯坦所在的土地（古称“迦南”）自古是上帝赐予自己的“应许土地”。从阿拉伯方面看，巴勒斯坦的每一寸土地都是先知穆罕默德留下的“瓦克夫”（Waqf，宗教财产），具有不可转让的神圣性质，这是哈马斯拒不承认以色列、企图消灭以色列并在整个巴勒斯坦地区建立政教合一伊斯兰国家的原因。^[2]

二是历次巴以冲突形成的战争创伤在双方民众心里埋下了仇恨的种子。从军事斗争的角度看，巴以冲突经历了阿以冲突、巴以冲突和哈以冲突三个历史时期。其中在阿以冲突阶段，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历经五次中东战争（1948年、1956年、1967年、1973年和1982年）。埃及和约旦先后于1979年和1994年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后，阿以冲突转入巴以冲突阶段，巴勒斯坦成为对抗以色列的主体。1993年巴以签署在双方和平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奥斯陆协议》，以法塔赫为代表的巴解组织主张只同以色列进行政治斗争，而哈马斯则主张继续同以色列进行军事斗争，自此巴以军事冲突主要表现为哈以冲突。持续70余年的冲突导致双方平民伤亡惨重、

[1] “Israeli-Palestinian Conflict: A Century of War, Heartbreak and Hope for Peace,” Sky News, October 16, 2023, <https://news.sky.com/story/israeli-palestinian-conflict-a-century-of-war-heartbreak-and-hope-for-peace-12982135>.

[2] 刘中民：《巴以冲突模式骤变震惊世界》，载《世界知识》2023年第21期，第31页。

流离失所，给两大民族造成了沉重的精神和心理创伤。巴以签署基于“以土地换和平”原则的《奥斯陆协议》30年来，双方领导人虽然多次接近达成新的和平协议，但终因遭受民意绑架而不得不在和平进程中裹足不前。

三是大国对巴以问题的介入增加了中东地区的阵营对立和矛盾复杂化。冷战期间，中东成为美苏全球对抗的一部分，美苏冷战与阿以热战盘根错节。冷战结束后，中东成为大国竞技的新舞台，美俄在中东地区纷纷培养代理人。美国将以色列、君主制阿拉伯国家、埃及、土耳其作为战略盟友，俄罗斯则将伊朗、叙利亚、阿尔及利亚、巴勒斯坦等作为安全伙伴。当今时代，在美俄博弈及伊朗、土耳其、沙特和以色列等中东强国之间的政治博弈中，都把巴以问题作为削弱战略竞争对手的筹码和工具。^[1]以土耳其为代表的“亲穆斯林兄弟会联盟”和以伊朗为代表的“什叶派抵抗联盟”把 Hamas 视为政治盟友，而以沙特、埃及、阿联酋、约旦等国为代表的“温和联盟”^[2]则一度将 Hamas 视为恐怖组织，在打压 Hamas 和穆斯林兄弟会方面与以色列形成了心照不宣的“准联盟”。

四是巴以“时间在我”的心理预期使双方都不愿在和谈中做出重大让步。巴以冲突是一场“世纪马拉松”式的政治竞赛。以色列政府和民众均认为巴以问题解决的时间在自己一方，其背后的理由是：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修建隔离墙以及加强对加沙地区的封锁后，境内“恐怖袭击”的次数明显减少；犹太人定居点不断扩大，巴勒斯坦实际控制的领土不断缩小并日益村落化、碎片化和虚无化。美国国际政治学家米尔斯海默（John

[1] 参见 Joseph L Votel,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The Current and Future Challenges in the Middle East,” Statement Before the Senate Armed Services Committee on the Posture of US Central Command, February 5, 2019.

[2] “温和联盟”较早由以色列学者提出，认为伊朗是中东地区秩序的挑战者，以色列、沙特、阿联酋、阿曼、巴林、科威特、埃及、约旦、摩洛哥等是中东秩序的维护者，后者均与西方国家保持密切的安全合作关系、反对伊朗的地区冒进政策，故形成了“温和联盟”。参见 Jonathan Spyer, “Behind the Lines: The Mirage of the Mideast’s ‘Moderate’ Alliance,” *the Jerusalem Post*, February 4, 2017。本文的“温和联盟”专指沙特、阿联酋、巴林、阿曼、科威特、约旦、埃及和摩洛哥8国，这些国家在俄乌冲突中不愿选边站，在巴以冲突中不愿对以色列采取实质性制裁措施，在美国和伊朗对抗中实施对冲战略，其外交政策具有温和化特点，故属于“温和联盟”。

Mearsheimer)认为,随着巴以权力平衡朝着不利于巴勒斯坦的方向发展,以色列终将在整个巴以地区建立一个“大以色列”,并通过驱逐巴勒斯坦人在整个巴以地区建立一个以犹太人为主体的国家。^[1]巴勒斯坦也同样认为时间的天平在自己一方:尽管以色列拥有巴无法超越的军事实力,巴无法在战场上战胜以,但巴争取自由与独立的斗争是人类正义事业,相对于以色列,巴在政治和外交上更加得道多助。另外,从人口比例来看,巴勒斯坦人的自然增长率高于犹太人。根据巴勒斯坦中央统计局的数据,截至2023年10月,巴勒斯坦加沙地区人口为223万人,约旦河西岸为325万人,加上巴勒斯坦难民和以色列境内的巴勒斯坦人,总人口达到1450万人^[2],远超过以色列境内的750万犹太人。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学者奥特曼(Jon Alterman)认为,巴以和平进程漫长而曲折,主要是双方都认为没有达成协议紧迫性。^[3]

三、国际社会关于巴以冲突治理的不同主张

近期的新一轮巴以冲突是1982年第五次中东战争结束以来双方爆发的最大规模的流血冲突,牵动了大国地缘政治的神经,深刻影响了国际政治格局。根据在巴以冲突问题上所持的立场,国际社会形成了挺以派、挺巴派和中间派三大阵营。这三派就巴以冲突的症结与治理路径存在不同理念主张,即反恐怖主义论、反殖民主义论和共生关系论。

[1] John Mearsheimer, “The Future of Palestine: Righteous Jews vs. the New Afrikaners,” *After Zionism: One State for Israel and Palestine*, London: Saqi Books, 2012, pp.184-188; Hsiu-Ping Bao, “The One-State Solution: An Alternative Approach to the Israeli-Palestinian Conflict?” *Asian Journal of Middle Eastern and Islamic Studies*, Vol.12, No.3, 2019. P.332.

[2] Palestinian Central Bureau of Statistics (PCBS), “Unleashing the Power of Gender Equality: Uplifting the Voices of Women and Girls to Unlock our World’s Infinite Possibilities,” October 7, 2023, https://www.pcbs.gov.ps/portals/_pcbs/PressRelease/Press_En_IntPopulationDy2023E.pdf.

[3] Rachel Treisman, “Biden Wants a Two-state Solution for Israeli-Palestinian Peace: Is It Still Possible?” National Public Radio, October 27, 2023, <https://www.npr.org/2023/10/27/1208694837/two-state-solution-israeli-palestinian-conflict>.

（一）挺以派的“反恐怖主义论”

挺以派从“专制与民主”“恐怖与反恐”的二分法入手，将巴以冲突久拖不决的责任推给巴勒斯坦一方，认为冲突的实质不是巴以问题，而是哈马斯问题。这一阵营谴责哈马斯是“暴力极端组织”和“麻烦制造者”，将哈马斯认定为“恐怖组织”，甚至将之与“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相提并论，认为以色列对哈马斯的打击是反恐行动，是以色列自卫权的一部分。挺以派普遍认为巴以问题久拖不决的症结在于哈马斯在立法、政策、实践层面均否认以色列国存在的合法性。挺以派按照对以色列支持程度的不同大致可分为以下三大力量：

一是美国。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拜登政府向以色列提供了军事、政治、外交和财政等全方位支持，包括向中东派出两个航母打击群，在中东增加部署“萨德”与“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向以色列提供大批武器弹药，打击反以武装等。拜登政府强调以色列拥有自卫权，支持以色列在加沙针对哈马斯的“反恐行动”，强调国际社会必须谴责和制裁哈马斯。美国还以巴以停火决议草案没有谴责哈马斯、没有强调以色列拥有自卫权为由，在联合国安理会连续动用否决权，先后否决了俄罗斯、巴西、阿联酋和阿尔及利亚等国提出的多份巴以问题草案，为以色列在加沙采取军事行动赢得了时间，并在联合国大会投票支持以色列，为以色列在加沙的行动辩护。例如，2023年12月8日，阿联酋向联合国安理会提交了一份由97个国家支持的决议草案，要求巴以立即停火止战，同时要求释放所有人质并开辟人道主义走廊。尽管对此安理会13国赞成、1国弃权（英国），但美国仍投下了否决票。^[1]12月12日，联合国大会以153票支持、23票弃权的投票结果通过决议，要求在加沙地带立即实现人道主义停火，只有美国等10个国家投了反对票。^[2]

[1] “US Vetoes Resolution on Gaza Which Called for ‘Immediate Humanitarian Ceasefire’,” United Nations News, December 8, 2023, <https://news.un.org/en/story/2023/12/1144562>.

[2] “UN General Assembly Votes by Large Majority for Immediate Humanitarian Ceasefire During Emergency Session,” United Nations News, December 12, 2023, <https://news.un.org/en/story/2023/12/1144717>.

为在军事上策应以色列对哈马斯和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2024年1月以来，美军多次对也门胡塞武装以及伊拉克、叙利亚境内的什叶派武装等亲伊朗的反以力量发动袭击。

二是英国和欧盟。它们谴责哈马斯“滥杀无辜”，认为哈马斯把平民当盾牌，无疑是恐怖组织，同时也呼吁以色列在加沙采取军事行动时要区分哈马斯与巴勒斯坦平民，不要实施“集体惩罚”。但随着加沙人道主义危机不断升级，英国和欧盟内部也出现了分歧。以英国和德国为代表的一些国家强调以色列拥有自卫权，不认为以色列在加沙的行动构成了“种族灭绝罪”；而以西班牙和法国为代表的另一些国家则认为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已经超出了自卫范围，造成了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故支持安理会通过立即停火决议。尽管欧洲国家在应对巴以冲突的政策立场上出现一定分歧，但它们的亲以态度总体上没有改变。

三是印度和日本。这两国在道义上谴责哈马斯，偏向以色列，但未向以色列提供外交和政治支持，且不支持以色列在加沙地区扩大战火、伤及无辜。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突袭后，印度第一时间谴责其“滥杀无辜”，印度总理莫迪（Narendra Modi）抢在美国总统拜登前在“X”（即原来的“推特”）平台上发表声明称：“在此以色列的艰难时刻，印度坚定地与以色列站在一起。”^[1]印度谴责哈马斯，却对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保持沉默。印度选择偏向以色列，与以色列是印度主要军火供应商且在印度与巴基斯坦的冲突中坚定地站在印度一边不无关系。巴以冲突爆发后，西方七国集团外长齐聚日本，日本外相上川阳子在会晤中谴责哈马斯对平民的袭击，同时宣布向加沙地区提供6500万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2]

值得注意的是，美英等西方国家当局虽然表面上也赞成“两国方案”，

[1] Jonathan Fenton-Harvey, “Why India Has Embraced Israel Amid the Gaza War,” *the New Arab*, December 5, 2023, <https://www.newarab.com/analysis/why-india-has-embraced-israel-amid-gaza-war>.

[2] “Japan Pledges \$65 Million in Humanitarian Aid for Gaza,” *the Times of Israel*, November 4, 2023, https://www.timesofisrael.com/liveblog_entry/japan-pledges-65-million-in-humanitarian-aid-for-gaza/.

但尚未承认巴勒斯坦是主权国家，在巴勒斯坦国的边界和首都等问题上也立场模糊。随着此次巴以冲突的延宕以及以色列日益强调“将保持对整个约旦河西岸的军事控制”和“反对任何威胁以色列安全的巴勒斯坦建国方案”，特别是国际社会广泛呼吁用“两国方案”解决巴以问题，美国支持巴勒斯坦建国的立场不断加强，称“如果巴勒斯坦不建国，就没有办法解决以色列的长期挑战”，英国则称“准备提前正式承认巴勒斯坦国”。

（二）挺巴派的“反殖民主义论”

挺巴派从“殖民化”与“去殖民化”的叙事出发，认为巴以问题的症结在于以色列的霸权、霸凌和霸道政策，解除以色列对加沙长达 17 年的封锁本质上与 20 世纪 90 年代结束白人在南非的种族隔离统治是一样的，代表了人类正义的方向。

以色列在加沙的地面进攻导致人道主义危机后，阿拉伯、伊斯兰国家和“全球南方”的左翼政府普遍站在支持巴勒斯坦正义事业的一边。2023 年 11 月 11 日，伊斯兰国家主要领导人齐聚利雅得，召开关于巴以问题的紧急会议，土耳其、伊朗、埃及、印尼、沙特、卡塔尔、约旦、叙利亚等阿拉伯、伊斯兰国家领导人出席。会议通过的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酿成了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支持巴勒斯坦独立建国。^[1]

挺巴派可分为四大分支，分别是“什叶派抵抗联盟”“亲穆斯林兄弟会联盟”“温和联盟”和“全球南方”左翼政府的“反以阵营”。由伊朗、叙利亚两国及也门胡塞武装、黎巴嫩真主党、伊拉克“人民动员组织”和“真主旅”等组成的“什叶派抵抗联盟”在军事上支持巴勒斯坦，支持哈马斯军事对抗以色列，反对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土地的占领和对加沙以及约旦河西岸地区的封锁政策，呼吁国际社会一道制裁以色列。以土耳其和卡塔尔为代表的“亲穆斯林兄弟会联盟”在政治上支持巴勒斯坦，将以色列认定为“国家恐怖主义”，认为以色列对加沙的轰炸是一场“大屠杀”，呼吁国

[1] Organization of Islamic Cooperation, “Resolution of the Joint Arab Islamic Extraordinary Summit on Israeli Aggression Against the Palestinian People,” November 11, 2023, pp.2-4.

际社会一道抵制以色列。以沙特、埃及、约旦和阿联酋为代表的阿拉伯“温和联盟”在道义上支持巴勒斯坦，支持在加沙地区全面实现人道主义停火，反对以色列在加沙屠杀平民，但未对其采取实质性制裁举措。由“全球南方”左翼政府组成的“反以阵营”在外交上支持巴勒斯坦，在捍卫巴勒斯坦建国权、反对以色列在加沙制造人道主义危机方面存在一致看法。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造成严重人道主义危机后，玻利维亚宣布同以色列断交，南非降级了与以色列的外交关系，南非、哥伦比亚、智利、乍得、巴西等国家宣布召回驻以大使。2023年11月，南非还在国际刑事法院（ICC）提起诉讼，要求对以色列政府在加沙犯下的战争罪开展调查，并于2024年1月将以色列告上海牙国际法院（ICJ），指控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具有“种族灭绝性质”，违反了联合国《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1]2024年2月，巴西总统卢拉（Luiz Inácio Lula da Silva）指责以色列在加沙对巴勒斯坦平民实施了“种族屠杀”。

（三）中间派的“共生关系论”

在巴以冲突中，联合国和绝大多数“全球南方”国家（主要指亚非拉地区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属于中间派。中间派从共同安全与合作安全的视角强调安全不可分割、和平相互依存，主张巴以问题的解决应跳出零和博弈思维，认为绝对安全会变成绝对不安全，以暴制暴只会使各方陷入冲突的漩涡；认为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的“两国方案”符合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双方利益，是合作的最大公分母。

联合国主张从巴以冲突问题本身的是非曲直出发伸张正义。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António Guterres）在2023年10月24日的安理会巴以问题公开辩论会上强调， Hamas 袭击以色列理应受到谴责，但“Hamas 的袭击并不是凭空而来的，巴勒斯坦人民已经遭受了56年令人窒息的占领”，并再次呼吁立即实现人道主义停火，切实落实“两国方案”。这引起了以色列方面的强烈不满，其驻联合国代表吉拉德·埃尔丹（Gilad Erdan）甚至两

[1] 董卓锐：《起诉以色列，南非为何站上国际反以斗争“第一线”？》，凤凰网，2024年1月10日，<https://news.ifeng.com/c/8WEcHkyJpTJ>。

度要求古特雷斯辞职。

“全球南方”国家是中间派的主要成员。这些国家普遍认为，冲突没有赢家，和平没有输家，巴以双方必须立即停火止战，暴力冲突只会引发新的仇恨，“两国方案”是解决巴以冲突的根本出路。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袭击以色列平民时，部分“全球南方”国家谴责了哈马斯，但随着以色列在加沙地区扩大战火、殃及平民，这些国家认为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已经超过了自卫的范围，实际上是对巴勒斯坦平民的集体惩罚。^[1]

俄罗斯也是中间派的重要一员。巴以冲突刚爆发时，俄罗斯即邀请哈马斯政治领导人代表团访俄，表示愿意就哈马斯释放人质和从加沙撤侨问题开展外交斡旋。2023年12月，俄罗斯总统普京（Vladimir Putin）在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时表示愿意在巴以之间劝和促谈。同其他中间派国家一样，俄罗斯主张采取外交和政治手段化解巴以冲突，通过“两国方案”实现巴勒斯坦独立建国和巴以和平共处。

四、新一轮巴以冲突的多重影响

巴以问题拥有复杂的历史经纬，其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成为阿以关系正常化与中东“和解潮”的巨大障碍。新一轮巴以冲突已经延续4个多月，对巴以关系、地区局势和大国战略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进一步增加了“两国方案”的落实难度

“两国方案”是巴以求同存异、开展合作的最大公分母，但旷日持久的巴以冲突对落实该方案的基础造成了严重损害。美国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一项民意测验表明，支持“两国方案”的巴勒斯坦人从2012年占总人数的59%下降到了2023年9月的24%；支持“两国方案”

[1] 中东新闻网：《联合国报告：以色列是占领力量，无权在加沙进行自卫》（阿拉伯文），2023年11月3日，<https://asharq.com/politics/71351/>。لـيـئـاـر سـا إـمـم أـة رـر قـم / لـا لـتـح اـة وـق -ة ز غ -ي ف -س ف ن ل ا -ع -ع ا ف د ل ا -ح

的以色列人从2013年的50%下降到了2023年9月的35%。巴以双方都认为“两国方案”(Two-State Solution)已经变成了“两国幻想”(Two-State Illusion)。^[1]新一轮巴以冲突进一步摧毁了双方本已脆弱的互信,使“两国方案”的落实更加困难。

首先,巴以冲突导致双方信任赤字增加,“两国方案”受到冷落。2020年以色列与多个阿拉伯国家签订《亚伯拉罕协议》以来,虽然巴勒斯坦问题被边缘化,但巴以双方依然基本上维持着对抗而不冲突的共识。新一轮巴以冲突导致双方数万平民伤亡,上百万加沙巴地区的巴勒斯坦人流离失所,在规模和影响上超过了1982年第五次中东战争以来双方的任何一次冲突。随着以色列不断扩大军事行动范围和也门胡塞武装、黎巴嫩真主党等力量不同程度地介入,此次冲突正在呈现长期化趋势,停火止战和人道主义救援正在成为比落实“两国方案”更加迫切的国际议题。以色列对加沙地区长达4个多月的军事行动,导致巴勒斯坦内部对以色列的仇恨和反犹太主义情绪上升,无论是约旦河西岸还是加沙地区,无论是巴解组织还是哈马斯、吉哈德,都难以接受同以色列和解的主张。新的战争创伤加重了巴以之间的民族仇恨,在“两国方案”框架内实现巴以和平共处更具挑战性。

其次,巴勒斯坦的内部分歧成为落实“两国方案”的又一障碍。巴勒斯坦内部两大派别法塔赫与哈马斯在建国理念上存在严重分歧。^[2]在未来国家的模式设计上,法塔赫致力于建立世俗、民主和多元文化的现代国家,强调未来巴勒斯坦国的阿拉伯属性。哈马斯则致力于建立政教合一的伊斯兰政权,强调未来国家的伊斯兰属性,明确宣布自己是“穆兄会的巴勒斯坦分部”。^[3]在外部力量对巴勒斯坦分而治之的背景下,哈马斯与法塔赫围绕“两国方案”达成和解的难度进一步增大。

[1] Rachel Treisman, “Biden Wants a Two-state Solution for Israeli-Palestinian Peace: Is It Still Possible?” National Public Radio, October 27, 2023, <https://www.npr.org/2023/10/27/1208694837/two-state-solution-israeli-palestinian-conflict>.

[2] [巴勒斯坦] 易卜拉欣·易卜拉欣:《巴勒斯坦分裂的根源及其对国家建构的威胁》(阿拉伯文),载《巴勒斯坦研究杂志》2009年第78期,第4页。

[3] 马晓霖:《穿越生死线》,北京:金城出版社2019年版,第492页。

再次，此轮巴以冲突使以色列国内不接受“两国方案”的态度更加普遍。以色列在此轮对加沙的军事行动中除了要消灭哈马斯外，完全占领当地并驱逐加沙巴勒斯坦人的野心也不断彰显。随着以色列在加沙和约旦河西岸地区实际控制面积的不断扩大，其接受“两国方案”的意愿也日益降低。2024年1月中旬以来，内塔尼亚胡等以色列高官就接连表达了明确反对“两国方案”的态度。此轮巴以冲突还加剧了以色列内部各种政治派别在巴勒斯坦独立建国和“两国方案”问题上的分歧，其主流右翼意识形态与温和派、自由派所倡导的“两国方案”渐行渐远。

最后，外部力量介入使“两国方案”的落实更加困难。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国际社会普遍倡导要落实“两国方案”，但其各个版本的性质与内涵有所不同。联合国和多数国家主张建立一个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享有完全主权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而美国则支持建立一个没有军队、没有哈马斯的半主权的巴勒斯坦，实际上是将巴勒斯坦国降级为以色列的一个“特区”。从地区力量来看，伊朗及哈马斯、也门胡塞武装、黎巴嫩真主党等“抵抗联盟”反对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殖民统治”，认为以色列在加沙犯了“战争罪”，否认以色列国存在的合法性，主张消灭以色列，这使“两国方案”的落实更加复杂化。

（二）导致中东战略格局和各国政策发生重大调整

从冷战时期到百年变局，中东始终是大国在全球最重要的战略地区之一。新一轮巴以冲突影响了大国之间的互动关系，各大国趋利避害，组建议题联盟，努力实现战略再平衡。

首先，巴以冲突打乱了美国拜登政府的中东战略布局。拜登政府上台后，希望在《亚伯拉罕协议》的基础上延续特朗普政府时期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的“建交潮”，进一步推动以色列与沙特建交，从而逐步实现以色列与阿拉伯、伊斯兰国家的整体性关系正常化。但新一轮巴以冲突使美国的上述计划受阻，以色列与沙特关系正常化谈判被迫暂停，导致拜登政府试图通过打造“美—以—阿拉伯统一战线”遏制伊朗的计划落空。不仅如此，

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美国从主动抽身中东到被迫重返,其对中东的军事、政治和外交投入从减少到被迫增加,拜登政府“先印太、再欧洲、后中东”的全球战略排序悄然发生变化。

其次,巴以冲突冲击了沙特的“全方位外交”布局。沙特、伊朗和以色列是一组特殊的“三角关系”。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爆发后,上述三大力量相互对抗、零和博弈,深刻影响了中东的地缘政治局面。2023年3月,在中国的斡旋下,沙特和伊朗实现了关系正常化。当年底,沙特本想通过与以色列和解,使自己在海湾、红海和地中海地区以及在伊朗和以色列之间左右逢源,并在以色列、沙特和伊朗三角关系中处于最有利地位。^[1]但新一轮巴以冲突的爆发打断了沙特与以色列的外交谈判进程,使沙特处于“温和联盟”“亲穆斯林兄弟会联盟”和“抵抗联盟”的夹缝之中,受到美国、以色列和广大阿拉伯、伊斯兰国家的多重压力,内部还受到力挺巴勒斯坦的民意压力,从而不得不通过“制衡战略”和“对冲战略”实现各种力量的相互制衡。

再次,巴以冲突改变了伊朗的战略环境。巴以冲突爆发后,伊朗在国际上利用该议题加强与阿拉伯、伊斯兰国家的政策协调,形成沙特领导下的“温和联盟”、土耳其领导下的“亲穆斯林兄弟会联盟”和伊朗领导下的“什叶派抵抗联盟”相互借力、共同支持巴勒斯坦事业的局面。这三大联盟反对以色列对加沙的重新占领,在外交上孤立以色列,增强了阿拉伯、伊斯兰国家的政治团结。此外,伊朗领导下的“抵抗联盟”多面出击,除哈马斯在加沙地区对以色列的军事围剿誓死抵抗外,为积极策应哈马斯的军事行动,黎巴嫩真主党对以色列北部发起空中袭击,也门胡塞武装和伊拉克“真主旅”也同支持以色列的美军发生交火,使美以联盟陷入多面受敌的被动局面。同时,2024年1月3日伊朗克尔曼市发生连环爆炸案后,胡塞武装在红海袭击驶往以色列的商船,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多次交火,“抵抗联盟”进一步加大对

[1] “Saudis Putting aside Arab Peace Initiative amid Israel,” *the Times of Israel*, December 10, 2023, <https://www.timesofisrael.com/saudis-putting-aside-arab-peace-initiative-amid-israel-normalization-talks-officials/>.

哈马斯和黎巴嫩真主党的支持力度，在红海和东地中海地区形成了对以色列的战略压制，从而使伊朗在中东地区的战略环境发生重大改变。

（三）对全球舆论和战略博弈态势产生巨大冲击

中东作为一个重要的地缘政治区域，其战略意义举足轻重。巴以冲突虽直接涉及仅3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1000多万人口，却产生了广泛的全球影响。

其一，巴以冲突的意识形态色彩使其成为全球舆论战的重要领域。巴以冲突既是有形的军事冲突，又是无形的意识形态冲突。哈马斯和以色列分别借助适合自己的不同社交媒体平台将舆论战推向全球。在全球舆论场，以色列国防军将自己塑造成“反恐斗士”和“正义之师”，哈马斯则将自己塑造成抵抗“犹太复国主义者”侵略和压迫的自由战士；支持巴勒斯坦的力量指责以色列是“国家恐怖主义”，犯下了战争罪，而支持以色列的力量则指责哈马斯是“伊斯兰恐怖主义”，站在了人类社会的对立面。南非在联合国国际法院起诉以色列在加沙地带进行“种族灭绝”，巴西、土耳其、伊朗、阿拉伯国家和不少“全球南方”国家声援南非，而以色列、美国和德国则坚决抵制。这些舆论宣传和意识形态斗争对世界各国的国内政治和民心民意产生了重要影响。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称，“洪水般”的虚假信息塑造了外界对巴以冲突的判断。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则用“战争迷雾”来形容社交媒体平台上关于巴以冲突虚假信息的泛滥程度。^[1]

其二，巴以冲突导致国际热点问题的连锁反应。巴以冲突、乌克兰危机、伊朗核问题及伊拉克和叙利亚问题等世界各地的热点问题相互联动，盘根错节。巴以冲突爆发后，西方国家纷纷优先援助以色列，给乌克兰的军事和经济援助明显减少，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俄罗斯在乌克兰战场上的压力。俄罗斯在外交上也利用巴以冲突创造的契机在中东频频出击。2023年12月，普京不顾国际刑事法院对自己发出的逮捕令，应邀访问阿联酋和沙特，就维持国际油价稳定和巴以人道主义停火等问题达成重要共识，增进了俄罗

[1]《巴以冲突第二战场：一场激烈搏杀的舆论战》，新华网，2023年10月24日，http://www.news.cn/world/2023-10/24/c_1212292984.htm。

斯与阿拉伯、伊斯兰国家的政治合作。普京访问阿联酋和沙特后第二天，伊朗总统莱希就访问了莫斯科，巴以问题和加沙局势成为俄伊领导人会谈的重要内容。2024年，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将在喀山举办，俄罗斯将担任该组织主席国，阿联酋与沙特将第一次以金砖国家正式成员身份赴俄参加峰会。普京希望借此进一步加强与海湾阿拉伯国家的联系，使这些国家在更多国际议题上与俄罗斯相向而行。^[1]俄罗斯以巴以冲突为契机，与西方开展外交周旋，部分改变了以往受孤立、受制裁、受打压的局面，改善了俄罗斯在乌克兰危机中面临的战略困境。

巴以冲突与伊朗核问题及伊拉克和叙利亚问题也存在密切联动关系。2023年9月，拜登政府批准与伊朗交换人质并豁免对伊60亿美元资产交易制裁。^[2]但巴以冲突爆发后，美国共和党和以色列都批评拜登政府对伊朗的“接触政策”，迫使拜登不得不追加对伊朗的制裁，在伊朗核问题上展现强硬姿态。2024年1月以来，巴以冲突的外溢风险进一步加剧。美国、土耳其、伊朗、以色列、约旦等频繁在伊拉克和叙利亚采取特别军事行动。伊拉克不愿成为各方博弈的竞技场，敦促美国关闭在其领土上的军事基地。

五、中国的立场及应对

巴以冲突延续百年之久，酿成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给巴以双方带来了深重灾难。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各种势力卷入其中，产生溢出效应，波及西亚、红海、北非、欧洲乃至全球。美国主导中东事务的能力与意愿下降，西方的巴以冲突治理方案乏善可陈，美以联盟与伊朗主导的“抵抗联盟”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加剧，巴以各自的内部问题久拖不决等等，共同导致新一

[1] “Russia’s Putin to Visit UAE, Saudi Arabia Tomorrow, Kremlin Confirms,” *the Khaleej Times*, December 5, 2023, <https://www.khaleejtimes.com/uae/russias-putin-to-visit-uae-saudi-arabia-tomorrow-kremlin-confirms>.

[2] 《拜登政府批准与伊朗交换人质并豁免对伊60亿美元资产交易制裁》，观察者网，2023年9月12日，https://www.guancha.cn/international/2023_09_12_708249.shtml。

轮巴以冲突愈演愈烈。巴以冲突牵动大国地缘政治博弈的神经，对中东地区国际关系和大国全球战略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中东格局的演进过程中，中国一直扮演着重要的建设性角色。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强调“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志同道合是伙伴，求同存异也是伙伴”。^[1]中国是巴勒斯坦的“战略伙伴”，也是以色列的“创新全面伙伴”，中国与巴以双方均保持友好合作关系。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中东最大的贸易伙伴国，中国积极为解决巴以冲突献计献策，在中东安全治理和危机管控问题上从未缺位。中国政府强调，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方案就是“两国方案”，就是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就是实现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和平共存。推进“两国方案”的正确路径是尽快恢复和谈，推进各类促和机制发挥积极作用。^[2]

首先，中国在解决巴以冲突问题上不断提供安全公共产品。在战略层面，中国站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提出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积极践行全球安全倡议。针对巴以冲突愈演愈烈的严峻形势，中国外交部于2023年11月发布《中国关于解决巴以冲突的立场文件》，提出了全面停火止战、切实保护平民、确保人道主义救援、加大外交斡旋、寻求政治解决五项政策主张。^[3]在制度层面，中国于2002年设立了中东问题特使机制，随后发起建立了中、巴、以三边和谈机制。中国还利用中阿合作论坛、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组织、亚洲相互合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等多边机制开展巴以冲突问题磋商。在中国的积极倡导下，2023年11月金砖国家领导人巴以问题特别视频峰会成功举行。习近平主席从停火止战、人道援助、危机管控三个维度阐释了中国关于巴以冲突问题的政

[1] 孙德刚、章捷莹：《大国战略竞争背景下中东地区格局的演进》，载《和平与发展》2023年第2期，第51页。

[2] 翟隽：《在第十届中阿关系暨中阿文明对话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致辞》，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23年第6期，第4页。

[3] 《外交部发布〈中国关于解决巴以冲突的立场文件〉》，载《人民日报》2023年12月1日，第2版。

策立场。^[1]在政策层面，中国提出了解决巴以问题的具体主张。中国呼吁安理会推动重启“两国方案”，在联合国主导和组织下，尽快召开更大规模、更具权威、更有实效的国际和平会议，制定落实“两国方案”的具体时间表和路线图，推动巴勒斯坦问题全面、公正、持久解决。

其次，中国在解决巴以冲突问题上不断提供智力公共产品。在危机管控和冲突降级问题上，中国坚持“以人为本”“公平正义”“综合治理”等理念，主张跳出原有的思维定式，为新时期巴以冲突的解决提供新思路。2023年11月29日，联合国举行“声援巴勒斯坦人民国际日”纪念大会，习近平主席向大会致贺电并指出，国际社会必须紧急行动起来，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全力推动停火止战，保护平民安全，制止人道灾难。在此基础上，尽快重启巴以和谈，尽早实现巴勒斯坦人民建国权、生存权、回归权。^[2]为缓解加沙人道主义局势，中国通过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和联合国机构提供了200万美元紧急人道主义援助，通过埃及向加沙地带提供了价值1500万元人民币的食品、药品等紧急人道主义物资，并将根据加沙人民需要，继续提供物资和其他援助。

总之，中国是“全球南方”国家的重要一员，强调国际社会在巴以问题上不应有私利，只有共同责任。巴以冲突的症结在于巴勒斯坦人民迟迟无法实现独立建国的合法民族权利。巴以冲突循环往复的惨痛教训充分说明，只有秉持共同安全理念才能实现可持续安全和巴以和平共处。

【收稿日期：2023-12-26】

【修回日期：2024-02-22】

（责任编辑：李万胜）

[1] 习近平：《推动停火止战 实现持久和平安全——在金砖国家领导人巴以问题特别视频峰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23年11月22日，第2版。

[2] 《习近平向“声援巴勒斯坦人民国际日”纪念大会致贺电》，载《人民日报》2023年12月1日，第1版。